

特别策划

一汪大渊归大海 千年焕章耀豫章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志刚 文/图

题记

汪，水深而广：汪洋；又作量词：一汪湖水；又作姓：汪伦。渊，深潭；深池。“汪大渊”从字面意思来说，就是又大又深的水潭，至少是桃花潭级别：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一汪大水，终究要汇入无边大海。从他的姓名来看，就跟大海有着宿命之缘，后人还可以从他的字“焕章”，为他的出海找到思想根源。百川归海，焕章为故乡豫章带来足以绵延千年的荣光。

2008年，在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”上的主旨演讲中，提到了“元代杰出的民间航海家汪大渊”。而中学历史课本里，汪大渊的名字熠熠生辉。

我们用全球化的眼光再次审视他的那两次远行，会明白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，中国人对这个蔚蓝色星球探索的广度，以及华夏文明攀登的高度。



汪大渊塑像，目光所及，有家乡，也有诗和远方。

汪大渊（约1311年—？），字焕章，江西南昌人，元代地理学家、航海家。他曾是最被低估的南昌“恩仔仔”之一。

由于他作为民间旅行家，不举功名，所以正史中对他并没有详细的记载，就连他的出生纪年，也是不甚确定的“约1311年”，记者根据仅存手稿中的草蛇灰线推论如下：

一是元代学者、诗人张翥（1287年—1368年）为汪大渊著作《岛夷志略》写的序言（张序），提到“西江汪君焕

章，当弱冠，尝两附舶东西洋……”

这里的“西江”，就是南昌。李商隐《赠司勋杜十三员外》里说“汉江远吊西江水，羊祜韦丹尽有碑”，指的是韦丹元和初（806年—814年）任洪州刺史，洪州首治南昌，故李商隐诗中“西江”指“南昌”，这可能是南昌又名“西江”的源头。

张序中除了点出汪大渊的籍贯外，还指出他是“弱冠”之年开始远行的。在《礼记·曲礼上》记有：男子二十冠而字。意思是，男子20岁时举行冠礼，并赐以字。必须注意的是，中国古代年岁记法为虚岁，“弱冠”对应现在的岁数是19岁。

有了出海的年龄，再去考证当时的干支，对应公元纪年，就能反推汪大渊的出生年份了。在《岛夷志略》“大佛山”（今斯里兰卡西海岸，于首次出海当年到达）条目中，汪大渊写道：“至顺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，因御帆于山下，是夜月明如昼……”这里出现了元文宗的年号“至顺”，干支“庚午”，还有季节、月份、日期“冬十月十有二日”，再通过天文印证当地经纬度月相“月明如昼”，可推理出当天是公元1330年11月14日。减去“弱冠”19岁，可算出汪大渊大约出生于公元1311年。

之所以是“约”，一是正史无载，亦无旁证，孤证不立；二是汪大渊出发之年确定了，但具体出发的日子失传（他有可能在年初乘东北季风从泉州经南海南下，至春夏到达东南亚，这时盛行西南季风，故盘桓于此，等待年尾东北风再次刮起，乘风向印度方向进发）；三是他的虚岁“弱冠”是以年号干支纪年的，对应公历出生于年尾或是年头都有可能，而年尾年头也许分属两年。

好在无论是张翥，还是元代文学家、历史学家吴鉴为《岛夷志》写的序言，都肯定了汪大渊是南昌人。

吴鉴，字明之，福建闽清县人。至正九年（1349年），吴鉴寓居泉州（曾为清源郡），得到了当时的泉州监郡侯王立的赏识，被聘为《清源续志》总纂，由此结识航海家汪大渊。至正九年十二月，吴鉴将汪大渊著述《岛夷志》附于《清源续志》之后，并为之作序：“唯豫章汪君焕章……足迹几半天下矣。”

汪大渊自述道：“至正己丑冬，大渊过泉州，适监郡侯王立三山吴鉴明之续《清源郡志》，顾以清源郡司所在，诸蕃辐辏之所，宜记录不鄙。谓余方知外事，属《岛夷志》附于郡志之后……”

吴鉴可谓独具慧眼，对于《岛夷志》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《清源续志》附录本成为《岛夷志》最早刊行本，这个版本在何乔远编撰《闽书》之时，依然在泉州流传。

烟涛渺茫信难求

一方水土一方人

8月6日中午，烈日当空，记者来到南昌市青云谱施尧村，寻访汪大渊留在故里的痕迹。

一般认为，汪大渊约于公元1311年（元至大四年）出生于施尧村汪家垄。

汪姓主要源自夏王朝时期古诸侯王罔。先秦时期，汪姓最初活动于浙江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、山东地区。两汉至唐朝，汪姓主要的活动地区在皖、赣、浙、苏地区，已发展为当地的望族，故李白在安徽泾县“赠汪伦”。宋朝时期，安徽、江西两省集中了汪姓总人口的77%，故南昌出现“汪山土库”“汪家垄”等明星地名。

一方水土一方人，从地理环境来看，施尧村位于赣江和抚河交汇处，向赣抚平原水网地带，缘水而兴，舟楫航运盛行。

施尧村得名有两种说法。其一，原名“施家嶺”，嶺是指地势较高的地方，东晋有施姓居住于此。其二，该村附近常有蛟龙出没且水患频繁，东晋许逊曾在此收服蛟龙治理水患，同时还为村民免费治病，使村民免受瘟疫之苦。村民都说许真君在村里施了恩惠，功德无量，将其与尧舜比肩，故将村子取名施尧村。

对于水乡来说，无论是施家嶺的“嶺”，还是汪家垄的“垄”（田中高处），都是人们为了避免水淹之苦而择居的相对高地，这是水乡的孑遗，也是文字的暗示。当天，记者穿过刻有“汪大渊故里”的一块大牌坊，进入施尧村故地，仔细寻访，发现经过数百年的沧桑，无论是“嶺”还是“垄”，都已化为平地失了踪迹。

好在还有一座版王庙，为汪大渊的人文脉络标下久远的注脚。

施尧村正对抚河的地方曾建有三座版王庙，据明、清《南昌县志》及早期《遐观山·万寿宫》记载，东晋时期，施尧一带屡遭抚河水患。每至农历四月初八，河中便出现坛口（漩涡），有河妖作怪，黑浪滔天。某年河妖作怪时，有一条运石船偏要往前驶，船上立着三位手执利剑的押运官，分别姓曾、熊、傅，他们将船冲向坛口，一时间狂风大作，波浪汹涌。三位好汉在狂风恶浪中与河妖拼杀，为镇住河妖，三人与船皆沉入河底，再没上来。从此河面太平，行船顺利。为纪念为民除害的壮士，人们在施尧村修建了三座版王庙。

历经一千多年，三座版王庙如今只剩下一座。

村中老者说，每年农历五月初一，村民在抚河水域开展龙舟赛，起因就是为了祭祀三位勇士。当地民谚“东湖的鱼，西湖的虾，施尧的龙舟赛万家”，流传至今已有千年历史。

版者，船也；版王，船王也。三位“版王”应该是当年防汛抗洪捐躯的勇士，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逐渐神化。当然，“船王”背后的隐喻是，施尧村附近自古就是艨艟大舰的制

直挂云帆济沧海

孔子身后，留下一声喟叹，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，这样的感叹，最易打动少年心。而元朝，恰是“道不行”的时代，他便响应孔子的号召，“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”。

根据“男子二十冠而字”的传统，他正是在出海这一年取字“焕章”，表达要到海外建立灿烂功绩的豪迈，或许还有“光耀豫章”为故乡打call的另一层意思。

带着老夫子的感叹，他从家门前的抚河登舟出发，舟行不远即转赣江南下，至赣州后沿贡水上溯，在武夷山前弃舟登岸，穿行于石城、瑞金入闽驿道，翻越武夷山脉后进入福建，遇水行舟，逢山走马，一路晓行夜宿，奔向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主港泉州。由此，一汪大渊归大海。

汪大渊于至顺元年（1330年），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，历经海南岛、占城、马六甲等地，到达印度次大陆、阿拉伯半岛，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——这是和汪大渊同时代的大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的故乡，也许在丹吉尔港口的某一片海滩，他们留下的足迹曾经重叠，可惜不是同一个时间。有意思的是，伊本·白图泰在元顺帝至元六年（1346年），学界有争论）到达泉州，对汪大渊的起帆之地进行了一次回访。不过此间汪大渊也许在南昌闭门写书，也许在另外的行商旅途，要到三年后才能再次回到泉州，因此两位旅行大家在泉州没有形成交集。

汪大渊从摩洛哥再回到埃及，出红海到索马里、莫桑比克，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、苏门答腊、爪哇，经澳洲到加里曼丹、菲律宾返回泉州，回国时已是1334年的夏秋。

四年多星辰大海的光阴，从太平洋到印度洋，再面朝大西洋，中间经历的惊涛骇浪与颠簸坎坷自不必说，出发时的弱冠少年，归来时

已是须眉男儿。

我们注意到，汪大渊的航海模式是“附舶”，也就是搭乘其他船主的船只，他并不曾拥有一艘海船。江右商帮的家族传统和航运港口的出生地，带给他经商头脑，还有勇于探索冒险的能量。分析《岛夷志略》的记载，他应该是带着伙计，租用海船的部分舱段，把江西丰富的瓷器、茶叶、丝绸贩卖到沿途各地，然后带回当地的特产，使自己的长途旅行得以持续。

三年后，也就是至元五年（1339年）夏秋之际，返航泉州。

汪大渊再次出现在现存史料中，已经是十年之后。至元己丑（1349年）冬，他再一次来到泉州。这十年间，他可能一部分时间在商旅中度过，另一部分时间在南昌写书，记述自己山一程海一程的奇幻旅程。这也解释了，他和编撰《清源续志》的吴鉴相交之后，不久就能拿出《岛夷志》文稿。吴鉴在序言中还提到，汪大渊“其目所及，皆为书以记之。校之五年旧志，大有径庭矣”。可见汪大渊写了不止一本书，只是后来都散佚了。

1350年，汪大渊回归故里南昌，将《岛夷志》节选为《岛夷志略》单本刊刻印行，由张翥作序，现存于世的版本，均为此版本。此后，他隐入尘烟，仿佛人间蒸发一般，因此有部分史料将他的生平定为公元1311年至1350年，照此推算，他39岁就英年早逝。

这个结论未免武断。

确实，进入1350年代之后，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南昌地区一度也沦为战场，朱元璋和陈友谅在洪州、鄱阳湖反复厮杀，施尧村也可能受到波及。不过，以汪大渊对世界和时局的了解，他完全可能隐居某地避难，从此不问世事。另外，在施尧村还流传一个说法，那就是汪大渊后来举家迁往泉州，随之泛舟海外，将华夏文明播撒四方。

就当这是家乡人的善意吧。

2012年，家乡人以汪大渊的字在施尧村附近命名了“焕章路”；2017年7月11日，汪大渊塑像在他出生地附近的抚河故道（现象湖风景区）岸边落成。8月7日，记者前往拜访时，只见他足踏宛如新月的航船，行驶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，坚毅的目光所及，近处是家乡，远方是西洋。

江西的全球化视野

□ 吴志刚

1773年12月16日，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波士顿夜色正浓。为了反抗英国对北美殖民地无止境的压榨，一群波士顿人悄悄来到格里芬码头，他们乔装登上三艘英国茶船，并把船上342箱来自中国的茶叶倒入大海。

波士顿倾茶事件直接导致英国与北美殖民地彻底决裂，美国独立战争很快打响。这是人类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缩影，东印度公司贩卖到北美的茶叶，直接参与了这一重大历史进程。而这批茶叶主要是武夷岩茶，其出发地，就是江西铅山县河口镇，当时作为江西、福建、浙江、安徽茶叶的集散中心和重要的外销茶加工中心，享有“万里茶路第一镇”的美誉。

在世界逐渐成为“地球村”的过程中，江西的地理优势、杰出人物和丰富物产，都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自唐代中叶到清代前期，运河一长江—赣江—珠江这一水路一直是国内沟通南北的大动脉，在这条通道上，江西独占其四分之一，处在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中枢，成为内陆通向海外的著名“黄金水道”。

元朝临川人朱思本，绘出了首幅两半球世界地图《舆地图》；明朝吉水人罗洪先绘制的《广舆图》，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分省地图集；另一位吉水人陈诚30年间五度出使西域……

汪大渊所著的《岛夷志略》，不仅被现代人评为影响中国的100本书之一，而且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，“他是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到达大西洋的中国人”，被誉为“东方的马可·波罗”。相反，“汪大渊是最早到过澳洲的航海家”则一直被西方存

疑，因为他们更渴望，也更“需要”留待1770年4月28日，也就是440年后，由英国人库克来“发现”澳大利亚，全然不顾当地还住着原住民毛利人和旅居的华人。

江西的陶瓷、茶叶和丝绸，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第一批过硬的商品，世界正是从江西的陶瓷和茶叶逐渐认识了中国。

研读《岛夷志略》，100个篇章，有40多篇记载了瓷器贸易，其中又有20多篇谈到青花瓷贸易。汪大渊所搭乘的海船，装满了以丝绸和瓷器为主的各种商品和货物。瓷器来自不同产地，除了景德镇产的青花瓷、青白瓷和青瓷，还有吉安窑和龙泉窑的青釉瓷器。

现在，人们很难把南昌跟大航海相连，这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，我们接受了“固于内陆”的定位。可当我们回望汪大渊的时候，应该扪心自问：何以大航海时代，由南昌人捷足先登？

首先，这跟秦汉以来南昌作为造船基地有关。汉武帝时，就有豫章大舶出海；其二，这跟唐宋以来海上陶瓷之路有关。到元代，景德镇窑取代了龙泉窑成为中国瓷业龙头，而景德镇的昌江，成了海上陶瓷之路的源头，从昌江入赣江，南昌就成了通海枢纽。南昌人接过景德镇转口贸易的第一棒，或经由长江，往太仓出海；或上溯赣江，往广州、泉州出海。

目前，南昌较缺乏闪耀“一带一路”的本土品牌，或许可以在市级层面激活“汪大渊”“万寿宫”“洪州窑”等这些全球化文化符号，使其承载的大气开放、拼搏进取的精神反哺经济社会发展。